

WENSHI ZHISHI

文史知识

学林寻步

论北魏诗歌的发展

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的命运

武学巅峰与老庄佛禅的无心境界

古代官服上的十二章纹

神界的地方官——城隍

陈美林

曹道衡

金冲及

葛兆光

李晓华

王景琳

1990

3



医药学院610 2 01478415

文史知识

1990年第3期

(总第105期)

• 治学之道·学林寻步 陈美林 3

• 文学史百题·论北魏诗歌的发展 曹道衡 11

• 历史百题·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的命运 金冲及 19

诗 刚 健 王明居 27

“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文 ——说曹植《吁嗟篇》 魏耕原 29

朝过三清又拜佛

欣 ——李商隐与佛教的关系兼说《华师》一诗 亦 明 34

既情深而兴雅 亦悱惻而洒落

赏 ——黄周星《满庭芳·送友人还会稽》试析 赵齐平 37

• 武侠小说漫谈 •

武学巅峰与老庄佛禅的无心境界 葛兆光 42

文化 古代官服上的十二章纹 李晓华 47

史 中国古代的信鸽传书 许惠民 51

知识 蜡烛琐言 夏桂苏 夏南强 56

• 古法丛谈·“法”中之“儒” 天下为公 梁治平 59

人物春秋 举世无双的“大树将军”——冯异 郭士正 62

东汉清白吏——杨震 段国超 68

绝代才情无觅处——明末才女倪仁吉 张 羽 74

• 文学人物画廊·书痴郎玉柱 万揆一 77

• 宗教与人生 • 神界的地方官——城隍 王景琳 81

散谈“夺胎换骨法” 黄勤堂 87

宋代的国家藏书 王承略 94

• 中国名著在国外 •

“视线所窥 永是东方”

——《红楼梦》在德国的流传与研究 胡文彬 100

• 青年园地 • “伍子”新解 陈立仲 108

• 读书札记 • 历史与现实的指南

——读《汉书·匈奴传·赞》随笔 朱先春 110

书 一部学习和研究郑板桥书法的必读书

评 ——《郑板桥判牍》评介 秦永龙 113

• 文史古迹 • 唐陵之冠——桥陵 孙 焱 117

• “我与《文史知识》”获奖征文选载 •

《文史知识》——我的良师益友 刘桂秋 121

智者的良友 成功的桥梁 徐 智 123

我与《文史知识》 尹序亭 124

我与《文史知识》 陶鸿飞 126

• 补白10则 • 愚不可及(29) 鼠死庐毁(33) 方蛇(41) 走虎捐
子(55) 食菌成仙(73) 明代内阁的实质(80) 以
私奉为心必众叛(93) 阿留守柳(107) 更化始可
善治(109) 病躁弗喻(116) 崇德辨惑(120)

古代官服上的十二章纹(封二) 陕西桥陵石雕(封三)

封面设计 吴寿松

学林寻步

陈美林



陈美林，江苏南京市人。回族。1932年生。1950年考入浙江大学原文学院中文系，现任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论著有《吴敬梓研究》、《新批〈儒林外史〉》等，以及多篇文史论文。

《文史知识》发表的海内外学人谈治学之道的文章，我是常读的，从中受益匪浅。尽管每位学人走过的道路不同，但他们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今编辑部的同志不以葑菲见弃，也约我写一篇“治学之道”的文章，颇令我惶惑不安。自惭学无所成，只能把自己在学术林藪中寻步的经历谈一谈。

我从大学毕业以后一直从事中国文学的教学工作。但我所讲授的内容，却是我在大学读书时很少学习过的。因为我从中学时代起就想当作家，进入浙大后，曾在浙江省文联组织下去余姚庵东盐区体验生活，一心想搞创作。特别是由于国家建设急需，政务院要求大学生提前一年毕业，夏承焘先生开设的中国文学史课程，在讲完唐宋文学以后就匆匆结束了。岂知毕业后，没有当作家，却去教书了，而且偏偏要教元明清文学。当时教研室主任钱仲联先生声言，他不搞小说、戏曲这玩艺儿，要我讲授。这样，

我只能确定元明清文学为自己教学和研究的范围了。六十年代初，由于钱仲联先生去上海与瞿禅师等人合编《中国古代文论选》，他所留下的唐宋文学课程，也一度由我兼授。同时，我自幼喜爱唐诗宋词，所以在元明清文学之林中寻步时，偶或也有一二步走近唐宋文学之林的边沿。

就这样，根据教学工作的需要，确定了自己的研究范围。从教书来说，这一范围是不能再缩小了，但从研究来说，这毕竟又是一个大圈子。为了教学的需要，不能不对整个元明清文学有一全面的了解，然而这毕竟是泛泛的了解。为了深入研究，必须找出突破点，即明确重点。我所选择的重点也是根据需要决定的。五十年代后期，中华书局来苏州组稿，由于明清之际的戏曲家李玉是苏州人，他们希望在苏州找一位作者撰写《李玉和〈清忠谱〉》书稿。我当时正讲授元明清戏曲小说，编写了近百万字的讲义，这一任务就落在我的头上。李玉虽是苏州人，但他的作品在苏州却找不到，只能利用寒暑假回南京时，去南京图书馆阅读，课余进行写作。此稿在1963年排出校样，但直到1980年方才出书。虽然这本小册子还算不上什么学术著作，但却促使我对以李玉为首的苏州派剧作家进行探讨，并进而带动我对整个元明清戏曲做进一步的研究。七十年代初期，从农场回南京师大不久，中文系负责人找我谈话，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委托我系整理《儒林外史》，由几位同志组成整理小组，要我也参加。在完成“前言”初稿后，我被调出小组。但个人对吴敬梓及其《儒林外史》的研究并未间断，先后出版了三种论著，发表了有关的研究论文四十余篇。文学性的传记《吴敬梓传》已发稿三年，为宝文堂节编的《儒林外史》业已交稿。因而，对吴敬梓及其《儒林外史》的研究，自然成为我在学林中追寻的主要目标了。

先划定寻步的范围为元明清文学，然后又确定重点，再由重点漫延开去。例如由李玉研究延伸，进而对董《西厢》、王《西厢》、《倩女离魂》、《牡丹亭》、《玉簪记》、《秣陵秋》以及元明清三代的

杂剧，都做了一番探索，发表和出版了一些论著；由吴敬梓研究延伸，对《水浒》、《后西游》、《歧路灯》等明清小说也做了一番研讨。由元明清戏曲、小说延伸，对元明清诗文也有所涉足，发表了《晚明爱国学者张岱》、《清代布衣诗人陈古渔》等文章。乃至为了编写教材需要，除了发表《论杜诗的形象思维》等有关杜甫的研究论文以外，还与人合作出版了《杜甫诗选析》一书，这又上溯至唐代文学。由于先后多次参加不同层次的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对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以后的一些文学史著作进行一番研究，1980年发表了《重视对文学史著作的研究工作》；同年又发表了《也谈比较文学》一文。

总之，回顾我的寻步历程，无不是服从工作需要，先确定研究范围，继而明确重点；从点的深入研讨，再度漫延开去，重又覆盖整个研究范围。

二

研究范围划定、重点明确之后，接下来就是如何读书和研究了。

五十年代初尚未有研究生，我在大学时虽然有幸聆听过郑奠、夏承焘、徐震堃、陆维钊、任铭善、孙席珍、王西彦诸位先生的课程，但却没有在他们直接指导下进行专题研究的幸运。尽管郑奠先生在我入学之初，要我随他专攻语言，其余课程可以少修，但我一心想当作家，便婉言推辞了。不过，当时学生很少，在听课之余，师生间的接触还是很多的。诸位先生的治学精神和方法，对我的影响很大。郑奠先生整整几箱的读书笔札；夏承焘先生融考证与评论于一炉的治学方法；徐震堃先生擅长古代文学却为我们开设世界语；孙席珍先生为我们讲授西洋文学时常联系中国文学进行比较；王西彦先生每讲授一专题，就是一篇学术论文……。因此可以说，虽然我讲授和研究的元明清文学，在大学学习期间并没有听过几位大师的传授，但仍然是他们的无声指导下进行

的。

在划定范围、明确重点以后，即边读书边研讨。先对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元明清文学的作家作品进行广泛浏览，以求有一全面的了解，然后再对重点作家作品进行仔细的研读。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又感到先前读书有限，不敷应用；因而根据研究课题的需要，再进一步搜寻资料、广泛阅读。如此循环，反复不已，如同滚雪球越滚越大，书也越读越多，而值得研究的课题必然会越来越多。以研究吴敬梓为例，过去授课时无非综合各家研究成果，自己的见解虽有也不多。一旦将它作为研究课题以后，就必须先细细研究吴敬梓本人著作《儒林外史》、《文木山房集》以及陆续发现的佚文佚诗。不仅如此，还要尽可能多地阅读他的亲友文集，如吴槩的《咫闻斋诗钞》、金巢的《泰然斋集》、金兆燕的《国子先生集》、程廷祚的《青溪文集》及续编、王又曾的《丁辛老屋集》、吴培源的《会心草堂集》、严长明的《严东有诗集》、郭肇锁的《佛香阁诗存》、陈古渔的《所知集》等等。在阅读这些文集中，又可根据其中的零星记载，蹊迹追踪，扩大阅读范围，如据《所知集》而寻阅洪月航的《宝田诗稿》、徐紫芝的《玉巢诗草》、戴瀚的《雪村编年诗牘》等等，以及涉及这些人物的碑铭、方志。这些，均可帮助我们了解吴敬梓的交游，以及他的生平片段和偶或闪现的思想火花。此外，还从吴敬梓生活以及足迹所至的有关地区的方志中寻查和勾稽资料。例如作者故乡全椒的志书，当年胡适作《吴敬梓传》和《吴敬梓年谱》时，仅见到张其浚于民国初年修的《全椒志》，而张志序中明说《全椒志》“自康熙年间蓝君学鉴成书以后，久未续刊，迄今二百余年，文献时虞失坠，遍求蓝志刊本，亦未即得”，由此可知胡适自然也未曾见到康熙蓝志。七十年代初，笔者前往安徽访书，终于见到蓝志。此志对研究全椒吴氏先世大有帮助益，因为与蓝学鉴一同纂修康熙志的吴国对，恰恰是吴敬梓的曾祖，至于编辑人员中的吴晟、校阅人员中的吴旦、吴勛、吴升、吴昱、吴晷，分辑人员中的吴暹吉，均为吴敬梓祖辈；志中辑录

有关吴敬梓先世的资料也颇多。在仔细阅读蓝志之后，发表了《康熙〈全椒志〉中有关吴敬梓先世资料》一文。寻得了这些资料，再结合其它一些材料，对吴敬梓先世的情况就有了更多的了解，从而可以对他的家族矛盾、财产纠纷、甚至思想渊源等问题作出更加深入的探讨和判定。

此外，我还从可能寻得有关吴敬梓材料的书籍中去“淘金”，如《金陵诗征》、《金陵通传》等等，也时有收获，如吴敬梓长子吴烺小传即见于《金陵通传》。自然，有时终日翻检也没有收获，但却可能有副产品。我曾涉猎清初有关科举、制艺等方面的图籍，如清初八股文大家湖北黄冈人刘子壮等人的著述，希望发现一些有助于研究《儒林外史》的材料，并没有很多收获。但在刘子壮的《杞思堂文集》中却发现了《宋元春秋序》一文，知道《水浒传》曾更名为《宋元春秋》。海内外研究《水浒传》者鲜有提及，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中虽有披露，但限于该书体例，既未录出刘子壮这篇序文，又很少有评论，而于刘之生平、思想亦仅有极为简略的介绍。我细读《杞思堂文集》全书后即根据有关材料，撰文介绍，并录出刘序全文。此后，又写了《〈宋元春秋〉序略评》一文发表。这也算得上是“开卷有益”了。

自然，有时读书既未查到自己研究课题的任何资料，也一时未有“副产品”，例如在撰写《李玉和〈清忠谱〉》书稿时，为了寻找李玉材料，翻检了图书馆中所能见到的《苏州府志》、《吴县志》以后，又闻知章太炎夫人汤国梨藏有海内孤本康熙三十年《吴县志》，笔者便去苏州锦帆路章府拜访，承汤先生热情接待，在她书房中读书一周。虽然从这一部志书中未曾寻得有关李玉材料，但却亲睹了这一海内孤本的面貌，也不能说是毫无收获的。

除了自己研究课题所必需阅读的书籍之外，还不断扩大自己的阅读范围，诸如西洋文学、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以及我国现、当代文学名著，也时时涉猎；至于哲学、史学（包括正史、笔记、专题史、断代史）也有所选择地或深入钻研或一般浏览，以扩大

自己的视野、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素养，从而能在更广阔的背景中考察自己的研究对象。

总之，读书、研究，不断交替进行，学习无止境，研究无了时，读书日益多，成果渐次丰。

三

做学问，自然要讲究方法，但如果将方法提高到不适当的位置来看待，似乎做学问，只要掌握什么秘诀，即能点铁成金，大出成果，这只能是幻想。他人的治学经验、方法，都可借鉴，但毕竟还得靠自己在实践中探索和总结。这里我想谈谈个人在研究过程中注意的几个问题。

首先，注意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也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从事文学研究的人都说文学是人学。文学是作家反映现实人生的作品，因而它不但融汇了被反映者的思想感情，而且也必然蕴藏着反映者的思想感情。中外古今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概莫能外。因此，对我们的研究对象，从阅读、欣赏到考证、评论，都不能抱着冷漠的态度，必须摸索到作者的脉搏和心弦，并努力将自己化为作者，设身处地考虑作者创作时的客观环境和主观心态。然而，我们毕竟不是作者，又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度评论既往的作家，正如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所言，“每个时代都把悬案重新审查；每个时代都根据各自的观点审查。”因此，我们在化为作者，与之融成一体之后，又必须离开作者，与之保持一定距离，这样才能对之做出客观而公允的描述与评价，此所谓“山外看青山，进山看草木”。在为吴敬梓撰写传记时，我也力图处理好这一关系。

其次，考据与评论并重，注意两者的统一。文学研究的目的在于重现作家对于他所反映的现实人生的艺术认识，在于总结作家用以反映现实人生的特定的艺术方式。而考据则是为廓清诸如作家史实、社会背景乃至典章制度等等障碍，为实现这一目的服务的手段。不过，考据虽然只是手段，对于研究者来说却有着极

为重要的意义，不可等闲视之。学术著作如没有经过切实考证的材料作为立论的基础，就会成为空论，如同建筑在沙滩上的高楼大厦，经受不住风吹雨打。但把考据视为学问的极至，除考据以外别无学问的观点也是不足取的。为了论证吴敬梓接受颜(元)李(塏)学说影响的可能性，在《颜李学说对吴敬梓的影响》一文中，我在将颜、李学说中有关教育、科举的言论与《儒林外史》进行比较之前，先行考证全椒吴氏与李塏的关系。在前人已经梳理的基础上，又考证出李塏是吴敬梓曾祖吴国对任顺天学政时取为“县学生员第一名”的，他的文章又是吴国对为之“开雕行世”的；李塏于康熙五十九年南下抵达江宁，在南京进行讲学活动时，吴敬梓正侍父疾于白下等等情节。有了这几条事实做为基础，再行判定吴敬梓曾经受到颜李学说的影响，就更为有力了。这是先从考据出发然后进行论说。有时原准备写评论文字，但经过研究后又不得不先行考证一番，例如对稿本《秣陵秋传奇》的研究就是如此。有的学人根据赵怀玉《离亭燕》词序，将此剧归之于庄逵吉所作，并因庄之生存年代，从而断定传奇序文中所云“庚子”当为乾隆四十五年。原先我也信之不疑，但细加研究后发现传奇所反映的内容与庄逵吉生活时代的社会现实颇多不合，甚至有发生在道光年间的事件。因之不得不重加推寻，检阅有关碑传方志和各家文集，在理清庄逵吉生平史实的基础上，判定序文中的“庚子”当为道光二十年，现存的《秣陵秋》只是与庄逵吉所作同名的另一作者的创作。经过一番梳理，却写成一篇《稿本〈秣陵秋传奇〉作者和创作时代考辨》的考据文字，与原先准备撰写评论文字的意图全然不同。由此可见，没有坚实的考据做根据，是无法进行正确的评论的。

此外，兼顾横通与纵贯，力求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我常将自己研究的作家作品与其之前之后的作家，与其它文学样式中同一题材的作品放在一起加以考察，结合当时的文化背景(历史的、哲学的……)进行探索，并尽可能地与世界文学中某些类似的作家

作品进行比较，以便在更广阔背景下作出评价。例如《试论杂剧〈女贞观〉和传奇〈玉簪记〉》一文，先探索了笔记、小说、杂剧、传奇、弹词等不同文艺形式中有关潘必正、陈妙常恋爱故事的作品，作一史的回顾；然后选定杂剧《女贞观》与传奇《玉簪记》，并联系小说《张于湖传》进行比较，从当时的经济发展、社会思潮，以及作者的生活道路和文化素养等方面，加以研讨。又如，在《论〈儒林外史〉的结构艺术》一文中，从菲力克思·达文评价巴尔扎克《十九世纪风俗研究》的论说谈起，结合列夫·托尔斯泰、萨克雷、契可夫等文学巨匠的作品和言论，对“五四”前后一度出现的非难《儒林外史》结构艺术的言论进行商榷。而在《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一文中，从当时的社会情况、文学发展传统，全椒吴氏的治学和从政经历，以及吴敬梓个人的生活遭遇、文学素养等方面，研究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产生的条件。而在讨论其讽刺艺术时，不但将其与开创美刺传统的《诗经》而后的中国文学中的讽刺作品进行比较，还引述几乎与吴敬梓同时代的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家菲尔丁(1707—1754)的创作和言论来论证。在《也谈比较文学》一文中，又将它与莫里哀、巴尔扎克等大师的作品放在一起研讨。这样，就将我国文学史上这样一部“诚微词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的巨著，放在我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背景中进行评论。

上述几点是我在学林寻步过程中的点滴体会，但治学之路，还是需要自己去探索的。



论北魏诗歌的发展

· 文学史百题 ·

曹道衡

历来论南北朝诗歌的人，大抵只谈南朝，至于北朝，最多也只约略地谈一下后期的温子升、邢劭和魏收，而且往往只是一笔带过。至于北魏一朝百余年的诗歌，更很少有人注意。在这里，笔者试图对北魏诗的发展作一些论述，说明北朝后期诗趋向繁荣的原因。

在北魏前期，文学确实陷于一种衰落的状态。这是西晋末年以后长期的各族军阀混战造成的。关于这个问题，正如《周书·王褒庾信传论》说的，十六国文人“皆迫于仓卒，牵于战争。竞（章）奏符檄，则粲然可观；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这是符合当时的实况的。北魏的入据中原，使战乱渐趋停止，给文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但鲜卑拓跋氏在进入中原前本是一个汉化较浅的部族，

再加上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两代，还没有完成其统一北方的事业，不可能真正注意到文化和艺术。所以北朝文学的发轫时代，应在太武帝拓跋焘时。稍后的文成、献文二帝时，继续了这一过程。太武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他不但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而且也开始实行汉化的政策。《南齐书·魏虏传》说：“佛狸（太武帝小名）已来，稍僭华典，胡风国俗，杂相糅乱。”这就是说，在北魏朝廷的典章制度和贵族们的生活习惯中，已渐渐地受汉族的影响。所以牟润孙先生在《崔浩及其政敌》（见《注史斋丛稿》）中，已经提到了他实行汉化的问题。这是很精确的见解。我们试看《魏书·世祖（太武帝）纪》，他即位的第三年即始光三年（426），就在平城东建太学，“祀孔子，以颜渊配”。到了神䴥三年（430），他到了广宁，“临汤泉，作《温泉之歌》”。这首歌并未保存下来，究竟是用汉语还是鲜卑语所作，现在也无法确考。但他已亲自来从事文学创作。到了神䴥四年（431），他又下诏征召卢

玄、崔绰、高允、游雅等汉族士大夫，并且在诏书中引用了《周易》和《诗经》中的字句。此诏虽未必是他所作，至少也说明了他对汉族文化的重视和提倡。

推动太武帝实行汉化的原因，显然是由于北魏在当时已占领整个中原，并且在平城附近又移来了大批从事农耕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使农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大增，封建剥削的形式也渐占上风。这就迫使统治者不得不采用新的方法实行统治。

除了经济上的原因外，北魏的平定凉州（今甘肃西部）也进一步促进了汉化的过程。因为凉州在十六国初期由汉族张氏统治，维持了相对安定的局面。“永嘉之乱”中不少汉族士人，曾逃奔凉州。正当黄河中下游一带干戈扰攘之际，凉州文化却迅速地发展。所以《魏书·胡叟传》说：“自张氏以来，号有华风。”后来前凉虽亡，但继起后凉、西凉甚至北凉都很提倡文化。太武帝平凉州后，把大批文化人迁到平城，其中如张湛、宗钦、段承根等都很受黄河中下游士大夫们的重视。他们和河北一带的士大夫们交流了学术。如宗、段等曾作诗和崔浩、高允赠答；崔浩作《周易注》，也曾和张、宗、段等人讨论。这一批文人的到来，更促进了河北士大夫们从事文化活动的兴趣。

当然在强调凉州文化的影响外，对河北一带原有的文化基础也不应忽视。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以及刘聪、石勒的入侵，主要在黄河以南以洛阳为中心的一些地方。相反地，在今河北省及山东省内黄河以北地区，大体上也战乱较少。这里本是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汉末的大儒卢植就是范阳涿（今河北涿县）人；另一位大儒郑玄虽原籍高密（今属山东），晚年却居河北而卒于邺（今河北临漳）。北方望族为崔氏、卢氏和赵郡李氏都世居黄河以北；另一望族荥阳郑氏（今属河南），也在西晋灭亡时迁居冀州（见《魏中书令秘书监兖州刺史郑羲碑》）。据唐长孺先生曾认为魏晋的清谈和玄风，主要盛行于河南洛阳一带，至于河北一带，大体仍坚持汉代的儒学传统（参看《魏晋南北朝史论丛·读〈抱朴子〉推论南

北学风的异同》)。同样地，那些凉州文人虽然多少受过玄学的影响(如《魏书·程骏传》所载程骏、刘昺对老庄的看法)，但较之西晋时河南士人及后来东晋名士，毕竟不大一样。再加上北方的社会状况、自然条件以及大量少数民族的入居与融合，使北方人与南朝人的心理状态也有不少区别。因此北方文人在开始他们的文学活动时，就对南方某些文艺不很欣赏。据《郑羲碑》载，南朝宋齐间，北魏使人郑羲到宋，刘宋派主客郎孔道均接待。“酒行乐作”，孔问郑：“乐其何如？”郑答：“哀楚有余而雅正不足，其细已甚，而能久乎？”碑的作者夸耀郑羲从乐中预见了萧道成代宋之事，未免是附会。但这件事却说明像郑羲那样久居河北，深受汉儒影响的人对南朝流行的《子夜歌》等曲很难接受。因为根据汉儒的学说，这类音乐只能是“桑间濮上，亡国之音也”(《礼记·乐记》语)。不但如此，这些北方文人在艺术上只求“雅正”，就是对南朝谢灵运、鲍照之作，也未必欣赏。因为即使在南朝，也有人说谢灵运“放荡”(萧道成)，鲍照“险俗”(钟嵘)。试看高允、宗钦相赠答的诗，均属四言，手法上模仿《诗经》，显得十分古拙。严格说来，他们的诗实在很少诗意。所以从来的论者对此绝少论述。近人刘师培在《南北学派不同论》中对崔浩、高允之文较有肯定，说他们“磬壘自雄”，而不提高允之诗。其实“磬壘”无非指崔、高之文欠辞藻而已。平心而论，崔高之文虽失诸过于质朴，但亦非全无文采。如崔的《册封沮渠蒙逊为凉王文》；高的《鹿苑赋》，多少已有骈文的气息。至于诗，崔浩之诗今已不存，高允的四言诗质木无文已如上述，就是今存的一首五言和一首杂言诗都不过是一味模仿汉乐府，并无多大价值。但不管高允等人的诗怎样缺乏华藻和诗意，毕竟是北朝诗的开端。他们重新兴起了以诗赠答之风，说明作诗已经成为某些人的专长。

2 北朝诗自太武帝时开始，中经文成、献文二帝二十年左右的酝酿，到孝文帝时代，又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基本上延续到了宣武帝时代。孝文帝在历史上以

推行汉化闻名。他的加强汉化亦有其历史背景。除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封建剥削形式的进一步占优势和汉族高门士大夫的力量增长外，文化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这就是由于王肃入魏而带来了南朝文化。北方士族，本来对南方士族之倾心老庄并不赞成。如崔浩就不喜老庄。但稍后的高允就有所不同，他曾作《塞上翁诗》，“有混欣戚，遗得丧之致”。这“塞翁失马”的典故，原出《淮南子》，其书本有道家气息。至于凉州文人对老庄和玄学，本不像河北学者那样反感。再加上北魏献文帝晚年，颇倾向于老庄。《魏书·显祖（献文帝）纪》：“帝雅薄时务，常有遗世之心。”他关于禅位孝文帝的诏书，就富有道家色彩。《魏书·程骏传》载，他曾和程骏谈论《周易》和《老子》。在统治者的提倡下，士大夫们对老庄和玄学的态度有了变化，他们对南方那些富于玄学气的晋宋诗也渐能接受。孝文帝时代的诗，从形式上看，五言与杂言已多于四言；从内容上说，如宗钦、高允那样充满儒家说教气息的诗已很少见。这时期诗歌的一大特点是刻意地模仿南方的晋宋诗。这大约和孝文帝所引为辅佐的人物不少都来自南方有关。其中比较突出的是王肃，他本是南朝齐大臣王奂之子，逃到北魏后，据《魏书》本传称：“遂语及为国之道，肃陈说治乱，音韵雅畅，深会帝旨。”他“自谓君臣之际犹玄德之遇孔明也”。这样他就把南朝的许多制度和文化部门带到了北方。除了王肃以外，被称作“为世儒宗，亦当年之师表也”的刘芳，本是献文帝时北魏占领今山东一带而入魏的“平齐民”。他所带来的也是流行于南方的学说。

在典章制度以及学风丕变之际，士大夫们对南朝文学更是热心仿效。例如：《魏书·祖莹传》载，王肃到北方后，看到平城的荒凉景色，写了一首《悲平城》：

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

此诗深得孝文帝弟彭城王元勰欣赏，有一次元勰提到此诗时，误说成“悲彭城”，为了避免出笑话，祖莹在一旁立即口占一首《悲

彭城》。祖莹此首，形式上全仿王作，而生动不如。元颢本人也曾仿此诗以应孝文帝命作《问松林》。这些诗的形式和南朝民歌《华山畿》相近，但内容和情调完全不一样，多少体现了北方诗风悲凉慷慨的特色。如果说祖莹、元颢之模仿王肃，不过是亦步亦趋的文人戏谑的话，那么《洛阳伽蓝记》所载北魏公主仿作《子夜歌》则又是一种情况：

（王）肃在江南之日，聘谢氏为妻，及至京师，复尚公主，谢作五言诗以赠之。其诗曰：“本为箔上蚕，今作机上丝，得路逐胜去，颇懂缠绵时。”公主代肃答谢云：“针是贯线物，目中恒任丝，得帛缝新去，何能纳故时。”

王肃原配谢氏乃谢庄女，能诗本不足怪。至于公主乃孝文帝之妹，系鲜卑族，居然能用汉语写诗，且又逼真南方的《子夜歌》。这大约因为她在嫁王肃前，曾做过降魏的刘宋宗室刘昶的儿媳，对南方的音乐有所接触。但这也说明北方上层人物对南方文化的熟悉程度。

祖莹、元颢和陈留长公主所作短诗还只是随意口占，显示其才思的敏捷。至于另一些诗人作诗，却是刻意地模仿东晋、南朝诗人之作。例如：郑羲之子郑道昭（据说那块著名的《郑羲碑》就是他的书法），在北魏诗人中是出现较早且较有特色的。他的诗一般都为石刻题咏。其中字迹最完整的是《登云峰山观海岛诗》：

山游悦遥赏，观沧眇白沙。云路沈仙驾，灵章飞玉车。金轩接日彩，紫盖通月华。腾龙蔼星水，翻风映烟家。往来风云道，出入朱明霞。雾帐芳霄起，蓬台植汉邪。流精丽旻部，低翠曜天葩。此瞩宁独好，斯见理如麻。秦皇非徒驾，汉武岂空嗟。

郑道昭生活的年代大约和“永明诗人”相差无几。当南方的“永明诗人”已注意到“三易”（易识字、易见事、易读诵）时，北方的

写景诗还刚出现，并且充满了古气。从这首诗看来，郑道昭的诗风较近于郭璞及一些晋代诗人，然不如郭诗之流畅而富于比兴。这种诗也有排比铺陈的一面，多少与刘宋时谢灵运、鲍照相近。但它既不及谢之精工和富赡，也不及鲍之奇险和活泼。也许，这是北朝诗歌经过长期的冬眠后与南朝的差距。此诗作者是竭力在学习东晋南朝一些写景诗的技巧，尤其是有意识地模仿郭璞的《游仙诗》。这是北朝诗人较普遍的倾向。他们中有些人也多少认识到这一点。所以祖莹已说过：“文章须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魏书·祖莹传》）但他做起诗来，仍不免模仿王肃。

值得注意的是孝文帝以后的一些诗人由于学习东晋南朝诗，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感染了老庄思想。如郑道昭在《于莱城东十里与门徒登青阳岭太基山上四面及中顶扫石置仙坛诗》中就有“伊余莅东国，杖节牧齐壤，乘务惜暂暇，游此无事方，依岩论《孝》《老》，斟泉语经《庄》”等语。和他差不多时代的李谧作《神士赋歌》，也断言“周孔重儒教，庄老贵无为，二途虽如异，一是买声儿”。荥阳李氏和赵郡李氏本是河北儒学的世家，现在也谈起老庄来。甚至最坚持礼法的弘农华阴杨氏（见《魏书·杨播传》），到后来也出了杨元慎那样“读老庄，善言玄理。性嗜酒，饮至一石，神不乱常。慷慨叹不得与阮籍同时生”（《洛阳伽蓝记》卷二）的人物，甚至佛教徒宋云远适天竺，和人谈起中国的“圣人”，也“具说周孔老庄之德”（同书卷五）。这说明到孝文帝以后，北朝人的思想受南方清谈影响之深。

当然，在思想上深受南方影响，并不等于北方人士失去了自己特有的心理素质；也不等于在艺术成就上已经赶上南朝。所以这时北朝文人除了那位“陈留长公主”外，几乎无人仿作《子夜歌》一类写妇女题材的诗，甚至连情诗也很少。另外，在艺术技巧上。郑道昭在当时还是较有成就的诗人，但比之南方的“永明诗人”已见逊色，至于像被孝文帝评为“中第”的韩显宗等人，更是相形见绌。